

中国民族经济村庄调查丛书

总主编 刘永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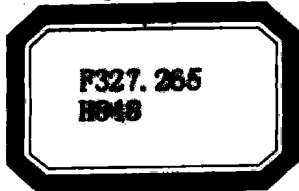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猎民新村调查

「鄂温克族」

黄健英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中国民族经济村庄调查丛书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猎民新村调查

(鄂温克族)

黄健英 主编

F327.265

14848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猎民新村调查 / 黄健英主编.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2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民族经济村庄调查丛书)

ISBN 978 - 7 - 5017 - 9225 - 2

I. 敖… II. 黄… III. 乡村—少数民族—民族经济—调查报告—根河市
IV. F127. 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207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 孙 岩 (电话: 010 - 68359418)

责任印制: 常 毅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0 × 240 毫米 1/16 印张: 20. 625 彩插: 16 页 字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9225 - 2/F · 8171

定价: 40. 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69586 68346406 68309176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中国民族经济村庄调查丛书编委会

主 任 刘永佶

委 员 李俊清 张丽君 李克强
杨思远 党秀云

主 编 刘永佶

本书写作分工

主 编：黄健英

副 主 编：杨晓光 倪永连

第一部分：李 诚 杨皓亮

第二部分：李惟一 靖 敏

第三部分：熊慧娟 徐丽斐

总序

村庄，是农民的聚居地，也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形式。村庄形成于农业文明时代，在中国最为典型和普遍，迄今依然是中国基本的社会单位。所有中国人，或是生于长于村庄，或是父祖辈来自村庄。村庄是中华民族的根基，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立足点和必须改变其内容和形式的地方。认知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了解村庄。

中国的民族经济，包括以下层次：一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经济，二是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支民族的经济，三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不论从哪个层次的研究，都必须涉及村庄这个基本单位。以往的民族经济研究和行政管理研究，对于村庄的关注，主要是在总体性的统计及对策方面，鲜有对某一村庄的专注系统调查。这种情况使我们所从事的理论探讨总显得有些飘浮，言不及意，大而不当。反思许久，不能不下决心从小处做起，将村庄调查作为根基，扎实做去。恰“九八五”项目实施，经费有所保障，故组织本创新基地近百名教师带二百博士、硕士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结十五调查组，计划用六、七年的暑、寒假，从五十六个支民族中各选一、二典型村庄，深入调查，总百余村，每村一书，为中国民族经济三个层次研究，为政府行政决策，提供基础资料。

夏庄调查

百村，不及中国村庄万分之一。我们的村庄调查虽只是抽样性质，但却是探根摸底，力求深入、真实、详细。二〇〇八年夏各组分赴河北、内蒙、宁夏、云南、广西调查点，历经一月左右，获初步资料。因为首次，困难颇多，思路和方法也要不断调整，秋、冬写作时又各自补充调查。时间虽短，但师生与村官、村民情谊颇深，既为调查提供条件，又为后续补充予以协助。各地党、政机构，对调查全力配合。无此，则调查难以进行。这套丛书，实为共同努力之成果，并赖中国经济出版社黄允成社长、孙岩主任鼎力支持，得以出版。本调查还要持续数年，望读者批评，我们再努力。

劉永信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八日

前 言

鄂温克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人口较少的民族，也是跨境民族，在俄罗斯、蒙古国境内都有分布。在中国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辽宁等省区也有分布，但人口不多，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国鄂温克族总人口为30505人，内蒙古自治区26201人，黑龙江省2706人，其它省区除西藏外都有分布。内蒙古的鄂温克族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有25418人，分布在该市各旗县市。

鄂温克族是内蒙古自治区“三少”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鄂温克族自治旗，其他散居在陈巴尔虎旗、根河市（原额尔古纳左旗）、莫力达瓦旗、阿荣旗、扎兰屯市等地，多与蒙古、达斡尔、汉、鄂伦春等民族交错杂居。这些地区处于呼伦贝尔草原的腹地、大兴安岭森林深处和嫩江流域的丘陵平原地带。这里有富饶的草原，起伏的高山，纵横的江河，还有众多的野生动、植物。物产丰富，自然环境优越，鄂温克族在这里生息繁衍，为当地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北部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

鄂温克族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但语言相当丰富，鄂温克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①，分为海拉尔、陈巴尔虎旗和敖鲁古雅三种方言，无本民族文字，牧区通用蒙古文，农区和林区通用汉文。鄂温克族大部分信仰萨满教，牧区有些人还信仰藏传佛教。

由于居住地不同，鄂温克族生产、生活方式也有较大的差异，有的从事畜牧业，有的从事农业，还有的从事狩猎业。生活在根河市的敖鲁古雅乡鄂温克族直到2003年前以狩猎业为主，是中国境内“最后的狩猎部落”。

历史上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祖先曾几度迁徙。18世纪初期，生活在外贝

^① 阿热本迁先生认为鄂温克语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鄂温克语支。通古斯语支语言在我国还有鄂伦春语，在苏联还有埃文基语。胡增益、朝克认为在我国属于满-通古斯语族的其他语言，还有满语、锡伯语、赫哲语和历史上女真人使用的女真语。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猎民新村调查

加尔湖沿岸和西伯利亚勒拿河流域的鄂温克猎民先祖经过长途跋涉，迁徙到大兴安岭这块山高林密、水草丰美、野兽出没频繁的地方。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过着吃兽肉、衣兽皮的游猎生活，驯鹿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蓝天作被地当床，北风为邻兽为伴”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落后的生产方式维持着简单的自给不足的再生产，天灾、人祸、疾病、战乱，敖鲁古雅使鹿部生活在极度困境之中，濒临在死亡线上。新中国成立时，使鹿部鄂温克族仅剩 136 人，驯鹿也仅存 400 多头。新中国成立后，结束了敖鲁古雅使鹿部餐风露宿、漂泊不定的生活。2003 年 8 月使鹿鄂温克猎民在政府组织下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三次搬迁定居。迁居新址位于根河市郊 4 公里处，即现在的猎民新村，新村有居民 61 户，230 多人，以鄂温克族家庭为主体，还有一些是不同民族通婚组成的家庭，但一般夫妻一方是鄂温克族，子女是鄂温克族。

由于历史上分布的特殊性，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狩猎鄂温克人的重视，自 1957 年成立奇乾人民公社，尤其是 1965 年实现定居，成立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以来，他们的行政隶属关系虽然经过一些调整，但基本以生活在大兴安岭北端的狩猎鄂温克族为主。也就是说敖乡的成立就是基于当时鄂温克族猎民的具体情况，而且自成立之日起，其管理体制和隶属关系与其他地区不同，一直是一个乡村合一的体制，即行政级别上是乡级组织，但其管理和服务的主体是鄂温克猎民。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前身是成立于 1957 年的奇乾人民公社，位于中俄边境地区。1965 年迁移到敖鲁古雅河与激流河交界的敖鲁古雅，开始定居生活，属于乡级行政单位。但由于长期没有村级组织机构，各村之间没有严格的行政区划，依靠各农场、林场属地管理，存在着林地之间的管理矛盾，耕地和草场均属于林业系统直接管理，所以敖乡的行政管理体制实际上是一个乡村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搬迁到现在的新址后虽拟成立四个行政村——孟库依村、齐斯毛斯克村、毛力克村、伊力古力村，直到 2008 年 7 月我们调研时，还没有建立相应的村级组织，仍是乡村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另外，由于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一些人口在行政和治安等方面属于敖乡管理，但在经济方面属于林业系统，其承包土地等都直属于林管局。如果减除这些原属林业系统的人口，现敖乡管理的人口要少一半左右，猎民新村的 62 户猎民是其主体。尤其从经济角度看，由于农地和林地都不属于敖乡的管理范围，其经济仍是以 62 户猎民为主体的驯鹿放养及其鹿产品加工，以及 2003 年定居后正在发展中的养殖业和旅游服务业。因此，敖乡虽然

是乡级行政单位，但从人口及经济特点来看，仍具有村的特点。同时这里是中国乃至亚洲唯一的使鹿部落——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聚居地。所以本次调研选取极具特色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猎民新村为调研对象，但有关村庄经济统计数据也包含了62户以外的其他经济体的数据。2003年前，除在行政和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外，敖乡的其他鄂温克族从事狩猎业，被称为“猎民”，现在搬迁到新址，虽然他们已放下猎枪，不再从事狩猎业，在当地仍沿用这一称谓，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和人口。本书也继续使用“猎民”这一传统称谓。

敖鲁古雅鄂温克经济的发展与其民族历史和文化紧密相连，而定居以来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也与民族传统产业和发展历史相关，所以敖鲁古雅鄂温克村庄经济研究不是纯粹的经济学问题，必须与民族发展的历史与传统相结合，才能全面把握敖鲁古雅鄂温克经济的全貌。同时也只有在尊重其传统和文化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振兴敖鲁古雅经济，最终使“亚洲唯一的使鹿部落”走上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因此本书在突出经济主线的同时，结合历史、社会和文化，展开分析。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分 村庄	(1)
一、敖鲁古雅鄂温克族	(1)
二、村庄的发展变迁	(10)
三、村庄经济概述	(26)
四、狩猎业和驯鹿业	(47)
五、手工业	(67)
六、旅游业	(73)
七、科技知识与应用	(90)
八、经济制度	(99)
九、经济社会发展政策	(107)
第二部分 猎户	(119)
一、以就业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	(120)
1. 关学文	(120)
2. 巴拉杰伊	(121)
3. 安塔	(123)
4. 张万军	(124)
5. 吴旭红	(125)
6. 巴特	(126)
7. 史胜权	(127)
8. 周明	(129)
二、以承包驯鹿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	(130)
1. 王英	(130)
2. 布建海	(133)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猎民新村调查

3. 范索	(134)
4. 马林东	(137)
5. 肖良柱	(138)
三、以经营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	(140)
1. 索云	(140)
2. 索荣花	(141)
四、以政府低保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	(143)
1. 古建峰	(143)
2. 其瑞梅	(144)
3. 杜林	(146)
4. 张树军	(147)
5. 古文强	(149)
6. 何丽梅	(151)
7. 古丽梅	(152)
8. 吴旭升	(153)
9. 吴旭珍	(155)
10. 肖良库	(156)
11. 杨双虎	(157)
12. 卜双军	(159)
13. 柳妮娜	(160)
14. 索玉兰	(160)
五、以旅游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	(161)
1. 阿荣布	(161)
六、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猎民新村家庭经济调查问卷分析	(162)
第三部分 猎民	(186)
一、新村经济发展的带头人	(186)
1. 卜伶生	(186)
2. 古香莲	(193)
3. 古金生	(198)
4. 巴特·古	(204)

二、驯鹿鄂温克人传统经济文化的传承者	(207)
1. 玛丽娅·索	(207)
2. 中妮好·古	(212)
3. 何海清	(215)
4. 格拉葛	(219)
5. 阿来克	(222)
6. 阿荣布	(226)
7. 得克沙·何	(232)
8. 维佳·索	(238)
9. 得克力	(242)
10. 吴旭红	(245)
三、特色经济经营者	(249)
1. 张乃林	(249)
2. 李乃颂	(252)
3. 古葛军	(258)
附录	(264)
附录 1: “驯鹿之乡”历史性的跨越发展 ——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和 社会发展综述	(264)
附录 2: 2003 - 2007 年敖鲁古雅乡鄂温克族猎民收入来源情况	(277)
附录 3: 敖乡驯鹿管理暂行办法	(278)
附录 4: 驯鹿承包户基本情况	(280)
附录 5: 根河市敖鲁古雅驯鹿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	(283)
附录 6: 驯鹿引种实验实施方案	(286)
附录 7: 2004 - 2006 年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猎民人均寿命情况	(289)
附录 8: 北欧撒米人驯鹿业发展模式对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 经济发展的启示	(290)
附录 9: 家庭户问卷调查	(295)
参考文献	(307)
后记	(308)

第一部分 村庄

一、敖鲁古雅鄂温克族

“鄂温克”是民族自称，意为“住在大山中的人们”。过去因居住地不同，鄂温克族曾分别被称为“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等，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人民的意愿，统称鄂温克族。被称为“索伦”、“通古斯”的两支鄂温克族大部分居住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鄂温克族自治旗和陈巴尔虎旗，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而被称为“雅库特”的鄂温克人就是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鄂温克猎民。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鄂温克族从事着传统的狩猎业，因为他们在狩猎的同时放养和使用驯鹿，常被称为“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鄂温克猎民”。本书所称的鄂温克族均指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由于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狩猎鄂温克族在社会发展阶段、文化习俗等方面都与从事农耕和畜牧的鄂温克族不同，具有自身的特点，一直是民族学界研究和关注的重点。有关狩猎鄂温克族的民族学研究较多，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在近 20 多年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对村庄经济的综合研究不多。

1. 族源及称谓

解放前鄂温克猎民常年游走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由于频繁的迁徙，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及居住地的不同，历史上，人们对他们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1) 族源

早在公元前 2000 多年，鄂温克猎民的祖先居住在外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唐代称“鞠国”，13—14 世纪，鄂温克猎民的先人们仍游猎在上述地区。16—17 世纪中叶，使鹿鄂温克猎民则居住在贝加尔湖西北勒拿河支流威吕河和维提姆河一带，共有 12 个大氏族，被称为使鹿的“喀木尼堪”或

“索伦别部”，酋长是叶雷、舍尔特库等。清代史籍称鄂温克猎民住地为“使鹿之邦”、“产狐貂之地”。1658年，沙俄侵占清朝领地贝加尔湖地区，鄂温克猎民被迫从勒拿河迁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深山里，每年从山上下几次，住在珠儿干河畔（以后形成珠儿干屯），即现在的额尔古纳市奇乾。之后的时间基本在额尔古纳河东岸，大兴安岭西北麓的原始森林中从事狩猎活动，并驯养驯鹿。至1965年9月以前，鄂温克猎民下山时的居住地一直是奇乾。1965年9月，在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下定居到现根河市境内的敖鲁古雅地区，成立敖鲁古雅鄂温克乡。2003年8月再次搬迁到根河市郊。

(2) 姓氏

16世纪时，鄂温克猎民在勒拿河流域时总共有12个姓氏，据史禄国1915年考察记录到的老姓氏只有3个：卡勒塔基尔、查卡基尔和金迪基尔。来到额尔古纳河流域的是其中的四个新姓氏，即布利托天姓氏、卡尔他昆姓氏、索罗共姓氏和给力克姓氏。以后又从列拿河流域迁来一个索罗托斯姓氏。布利托天姓氏和卡尔他昆姓氏是从卡勒塔基尔分化出来的。后来又从布利托天姓氏中分化出一个新的固德林姓氏，从索罗共姓氏中分化出玛嘎罗夫、特吉孟、恩快衣、索木孙等四个分支。索罗共姓氏是鄂温克猎民中比较大的姓氏。^①

从索罗共姓氏分化出来的四个分支的名字，都有一定的意思：如“玛嘎罗夫索罗共”的来源是：一个鄂温克猎民用弓箭和扎枪立过大功，他当时是阿尔巴吉河一带索罗共姓氏的族长，所以他的后代，就称为“玛嘎罗夫索罗共”。这几个分支之间，在原则上是不能通婚的，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大姓氏下面的分支。

布利托天姓氏在1913年前是人数最多的一个。他与鄂伦春人的巴鲁加基鲁是同一姓氏的分支。在瓦西利当“基那斯”（氏族长）时，不务正业，有一次在呼玛秋季的交易市场上，很多人批评他，他在会上承认错误。这个人的头发是卷曲的，叫“固德林”，所以他在会上宣布：“我从今以后不再姓布利托天，我和我的子孙都改姓固德林！”从此，他的子孙后代都是布利托天固德林，他们这时开始从布利托天中分化出来，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姓氏，与

^① 孔繁志：《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第20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

卡尔他昆姓氏的人在一起，受一个“基那斯”领导。固德林内部禁止通婚。^①

卡尔他昆姓氏是鄂温克猎民中人口较少的氏族。与鄂伦春人的卡尔他鲁鲁姓氏是一个古老氏族的分支。据说很早以前就没有自己的族长了，可能因为人数少的关系。该氏族有：“特吉孟”与“马立芬”二支。“特吉孟”是“纯粹”的意思，即真纯的人；而“马立芬”的来历，在鄂温克猎民中有这样的传说：过去有个老太太，她生了很多儿子，丈夫死后，就由她抚养，后来儿子们为了纪念母亲，就改以马立芬卡尔他昆为姓氏了。^②

给力克姓氏是最初来到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四个氏族之一。他们与索罗共姓氏不通婚，这说明，这两个氏族是从一个古老的氏族中分化出来的。给力克姓氏的人口很少，一直与索罗共姓氏在一起，受索罗共的领导。后来有一支成了“金千”，曾有自己的“基那斯”，1906年的“基那斯”是匹欧特。^③

这四个姓氏中都有一个族长，每个族长还有一个副职，他是族长的助手。族长和副族长都是由全体氏族成员选举出来的，任期年限不固定，但没有终身任职和世袭的现象。当时这四个姓氏组成的部落有一个最高的部落酋长，名叫瓦西里·牙克列维奇，1761年总酋长死去后，鄂温克猎民再没有共同的酋长了，改由俄国地方官“阿塔曼”掌管，地方官代表沙皇与鄂温克猎民的各个族长直接联系。这样就形成各姓氏独立的情况。^④

鄂温克猎民迁来时，并没有索罗托斯氏族，他们是后来从勒拿河迁来的。关于这个氏族的来源，流传着一个故事：

300年前鄂温克猎民迁来后，一年中有一个人领着自己的女儿回到勒拿河故乡去探亲。他们的亲戚是索罗托斯姓氏族的。当探亲时，他家的大儿子就爱上了他的女儿，有意成为夫妇。但自己不敢说，也不敢做主。当探亲的人领着女儿从勒拿河回来以后，这小子决定来找这个姑娘，结果成婚了。他们生了4个孩子，就变成了索罗托斯氏族的人。另外也有传说，因布利托天用俄文不好写，索罗托斯好写，所以就由布利托天改为索罗托斯了。1944年迁到苏联。

① 孔繁志：《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第20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② 孔繁志：《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第21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③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编：《鄂温克社会历史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④ 孔繁志：《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第21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每个姓氏中都有一个萨满。萨满在氏族中有很高的威望。萨满常常被选为族长。每个姓氏中都有若干“乌力楞”（氏族家庭）。^①

“萨满”一词按满一通古斯语解释为“激动不安”或“疯狂乱舞”，并含有卜卦算命的意思，这些含义集中用在巫师身上，“萨满”就成了巫师的专有名称。萨满教认为“萨满”是人和神的联络人，能与祖先神灵交往通话，作为人和神之间的“使者”。所以“萨满”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萨满教没有经典的教义，没有共同的创始人，没有庙宇，宗教活动也没有严格程序，主教是萨满。通过萨满的口传身受世代流传。

鄂温克猎民姓氏的名称，原来就是该氏族的姓。后来他们与俄国人接触之后，受其影响，接受东正教会神父给儿童命名等，于是名称就发生了变化，而他们原来的名称，则同时并存。

原来的卡尔他昆变成了卡尔他靠了夫，原来的索罗共就成了索罗共诺夫，原来的布利托天变成了布利拖拖夫，原来的给力克变成了给力克夫。

俄国化了的姓氏，都有自己的专名，并冠以族名及父名。例如：匹欧特（自名）·欧拖洛维奇（父名）·布利拖拖夫（氏族名）、阿力克山德（自名）·伊那见基（父名）·固德林（氏族名）。

长期以来，鄂温克猎民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改易原来多音节姓氏，而冠以汉字姓。与汉族通婚者的子女的姓有的与汉姓有联系。本族内通婚者的汉字姓，皆为单字，不存在单姓、复姓问题，是多音节姓氏的代表。猎民姓氏有其自己的含义、特点和规律，不能用汉族称谓习惯叫复姓，因此称谓汉字姓比较恰当。布利托天氏族简称姓布；索罗共氏族简称姓索；卡尔他昆氏族和给力克氏族，有的姓葛，有的姓何；固德林氏族简称姓古。^②

1945年8月，根据猎区和交易地点不同，激流河以北的鄂温克族猎民被称为贝斯特拉千（“千”是人们的意思），激流河以南的称之为古纳千。贝斯特拉千以索罗共诺夫氏族为主，古纳千以布利托天氏族、卡尔他昆氏族、给力克氏族和固德林氏族为主。漠河流域的被称为阿穆尔千，以索罗共诺夫氏族一部和索罗托斯氏族为主，服饰上还有所区别。1944年，阿穆尔千的鄂温克猎民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被迫迁到前苏联境内。1965年，定居

^① 孔繁志：《教鲁古雅的鄂温克人》，第21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② 孔繁志：《教鲁古雅的鄂温克人》，第22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